

论爱

De l'amour

Une philosophie pour le XXIe siècle

[法]吕克·费里 著 杜小真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论爱

De l'amour

Une philosophie pour le XXIe siècle

[法]吕克·费里 著 杜小真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3-12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爱 / (法) 吕克·费里 (Luc Ferry) 著；杜小真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

(沙发图书馆)

ISBN 978-7-301-27712-6

I. ①论… II. ①吕… ②杜… III. ①爱的理论－通俗读物
IV. ①B8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2607 号

De l'amour. Une philosophie pour le XXIe siècle, by Luc Ferry.

© ODILE JACOB, 2012.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s Odile Jacob,
Paris, France, through Dakai Agency.

书 名	论爱
	Lun Ai
著作责任者	[法] 吕克·费里 著 杜小真 译
责任编辑	田 炜 王晨玉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7712-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商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A5 7 印张 90 千字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 010-62756370

自序

我所说的“爱的革命”，即现代家庭的诞生——它源于从父母、村庄包办的婚姻到年轻人为爱自己选择的婚姻的过渡——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是一次和平、安静的革命，但并不妨碍它带来了一种新的生活意义原则。在我看来，它也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这次革命不仅震撼了我们的私人存在，还撼动了我们与群体之间的一切关系，也改变了生产、政治领域中的诸多人际关系。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二次人道主义”。第一次人道主义是法律和理性的人道主义，即启蒙和人权、法国共和派、伏尔泰和康德的人道主义，简言之，就是18世纪的欧洲人道主义。在许多方面，可以把第一次人道主义和儒家传统进行比较：二者都关注权利、正义，甚至同样关注学习、书籍、文化和精英选拔。第二次人道主义则不同。那是博爱、同情的人道主义，与现代个体主义的诞生紧密相关，这次运动与资本主义共生，导致在所有领域中的自主性诉求，但同样导致对他人的关心。我坚信，这种人道主义从此成为积极的乌托邦微风带来的唯一世界观。因为，它意欲实现的理想，不再是民族主义的，也不是造成成千上万死亡的革命理

念。人道主义不再是以你死我活原则、民族或革命的名义去发动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而是为我们最爱的人、我们的孩子、亲人、朋友还有他们之后的未来人，也就是即将降临的人们，为这所有人的未来做准备。这颇有些乌托邦的味道，但读者在这本书中可看到，这样的理念不仅依靠哲学，也不仅依靠主体性信念，而且或多或少都依靠真实的历史，首先是欧洲大陆的历史，这样的理念在今天通过全球化每天都延伸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尤其是延伸到中国社会。无疑，中国将来会是地球上最变幻不定、最富创造力的地方。

前 言

深陷全球危机之中的我们越来越感到与世界进程的疏离，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开的政治药方都不再适应现实，我们宣扬的种种价值也越来越不适应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能在这种精神分裂——或者在让我们按照显然过时的昨天的观念来思考现在的“自欺”——之中继续下去了。本书的首要目的是要指出，这长时间的偏离为什么、又是如何在人们尚未意识到的情况下正在催生一种新的意义原则，这种新原则将使我们得以重新把握我们的命运，重新调适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从而重新激发出我们可能相信的各种观念；本书还要分析由此在个体和群体生存的各个重要领域——家庭，政治，教育，艺术——中引发的种种深刻变化。

表达共和价值的公众话语（这些价值不再是争辩的活动，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参与其中，从极右到极左）现在属于我们借以看见我们存在（我们孩子的未来，我们生活中的男人或女人，一个让每个人都能充分发展的社会的来临）的真实活动的光明年代。由此产生不可调和的双方：一方是政府，它变换各种无疑是经过技术或策略证明的手段、但没有人能知道它的整体目的；另一方是满怀怨气、恐惧、愤怒

情绪的大众。

我们本不想把错误仅仅归咎于政治人物，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受到与他们相同的症兆的制约：我们像他们一样维护那些已经不再适应我们真实行动方式的原则。他们每天都反对消费主义的“云雀之镜”，而同样是他们，每六个月就要更换网络电话；他们鼓吹小学生恢复穿制服，却让自己的孩子袒胸露背地在脸书上露面；他们发誓唯环保为重，却乘坐没有任何安全保证的四轮车。人们把这些说成是“承受矛盾”，也就是说“我们什么都不能承担”的成功方式，或者不如说我们不可能选择用以真正达到协调一致的观念。简言之，我们的诸种表象不再适应我们内心体验的真实，这是我们趋向被普遍化了的“行我之言，而非行我之行”的行为。

如何解释这种分离呢？一个半世纪以来，艺术、哲学、我们的习俗，不断地把那些至此被遗忘、被边缘化或被压制的人类存在的诸多领域解放出来，随后赋之以更高价值：性意识，无意识，男人的女性部分或女人的男性部分，幼年，动物性，我们身上的自然性。波德莱尔^[1]并不是第一个被咒骂为“死老鼠”的人，但却是第一个使之成为艺术、第一个揭示想象的全部财富、本真性，能够在那些忧郁时刻发扬想象自由的人。他还打开了我们每个人都传承的领域。从菲利

[1] 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象征派诗人。主要作品有《恶之花》等。——本译本注释除标明“原注”，均为译者注，下同不另注。

普·德莱姆^[1]的《第一口啤酒》到贝纳巴尔^[2]的歌曲，从公园中心的周末晚会对“有权利不做完美妈妈”，我们没完没了地在重复波德莱尔的作品。这场运动曾经要求自己彻底反对资产阶级，但最终却荒谬地被世界资本主义接替并予以夸大，各种私人价值变成为公众价值准则的根源。赋予生活一种意义（上帝，祖国，革命）的一切伟大理想今天在欧洲都变得脆弱：爱于是成为我们所有人无条件相信的唯一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教育、健康、独立个人的参与、为子孙后代保护地球，更宽泛地说，一切有利于每个个体的彻底自我实现的创造性，都变成政治争论的中心主题。

问题恰恰在于，我们依赖的集体生活的主要理解框架并不重视已变成我们生存的这个关键部分。自由主义并不比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更多地把私人生活整合于活跃的公众生活。相反，从原则上讲，他们甚至把私人生活排斥在政治范围之外。显而易见，这是因为，在私人领域被滥用的公众权力所控制的过程中，对私人领域的自主性的扩张，他们怀有忧虑，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过在今天，反向的运动应该得到合法权利，因为很明显，日益发展的集体活动部分受到新的公众期待的启迪，而这会对协调不同个体的要求很有影响。这就让人们不得不承认：把政治仅仅规限于利益的经营是错误的，因为各种激

[1] 菲利普·德莱姆（Philippe Delerm），法国作家。他的短文集《第一口啤酒》，在法国已发行 80 多万册。在 22 个国家和地区翻译出版。

[2] 贝纳巴尔（Benabar），法国著名作曲家。

情永远在其中占有各自的决定性地位。只需读一下莎士比亚就足以理解这点。

换言之，我们的时代属于那些转换、特殊而又严峻的时代：我们的理解框架、文化界定在这样时代中遭受损害，这使得我们不再能面向事件的发展过程，更谈不上有效地调整它的方向，因为它欲求的是对于存在的视角的深刻变化。

二十多年前，当我遇到吕克·费里时，我们一下子就……相互责骂！几乎是在所有问题上：现代艺术，教育，政治……我那时绝对要求赋予这些存在的新形式以其全部意义，它们从此成为我们生活的核心。而他首先关注要把这些新形式与对人道主义的“非形而上学”的重新梳理整合起来，这种梳理保留了人道主义的不可超越的成果。无论如何，我们首先对不能停留于此、对可能支配的哲学已经变得不再够用的观点，达成共识，因为哲学因堕入尼采及其后继者或因为他们的哲学导致一种双重恒定话语，这种话语旨在彻底批评那些认为“存在着普遍道德价值”，而同时以同样的价值名义对待其流氓邻居的那些人。

从此，我们变成了世间最好的朋友。在千百次讨论中，我看到一种哲学崭露头角，我把感觉到的说了出来，这不仅得以克服我们的对立，而且特别带来一种适应我们运用思想所需要的答案，这种思想真正照亮现今世界和我们身在其中的核心生活本身。因为我们都是真诚坦白，我们的推理依靠的人生经验已具有部分真理。那么，对话的目的并不是谁要靠“不可辩驳”的论据战胜谁，而是要理解我

们争论的原因。

我现在感到吕克·费里在他最近的著作中发展了一种完全创新的、建立在新原则上的哲学，这种哲学让我们能够更直接、更深入地进入作为我们今天经验的世界经验。数十年（我不说一个多世纪）以来，是他第一次提出能够构建真正哲学体系的基础和发展这种体系的方法，也就是说，赋予我们的多样经验以真正和谐，即赋予我们生活总体一种意义的方式。

诚然，总会有人反驳说，我们是实用主义或者只制造“观念”：的确，为什么呢？除非没有什么比纯粹实在论的影响更加虚幻：经验证明那些宣称坚守于此的人们与其肯定的事情恰恰相反，他们不停地告诉我们“应该思想什么”，只是（*a ceci pres*）向我们使用那些我们用以观看的“已定观念”，而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新鲜内容。和许多人想象的相反，哲学并不只是为哲学家服务，甚至不是主要服务于他们。当笛卡尔建立一种只是基于“良知”——世界上分配最均匀的东西——和脍炙人口的“我思，我在”的哲学时，他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解放了直到法国大革命的几代人，他们的前人曾经长期漂泊不定，它们不知道是否应该重回教会指令，回归君主或亚里士多德传统的要求、听从父亲意志或他的任意支配：只需读一读莫里哀的戏剧就足以了解到剧中人物的爱情如何会受到这些合法冲突的阻挡。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人都利用了笛卡尔，甚至那些从未读过他的书的人！在 19 世纪，纯粹理性和道德观点的局限把法国革命引向难以克服的困境，这导致哲学家要重新理解人的存在中的那些被遗忘了的层

次：黑格尔的历史，马克思建立在生产关系上的阶级斗争，尼采的强力意志和无意识。

这就是吕克·费里向我们提出的可比较的革命。但这种新哲学在我看来，尚未完全而只是部分地显示出其明证性，因为作者关心教育，由于他部分运用各种（历史－人类学和观念的）分析善待其他很多哲学家，以这些分析确立他的论题。无疑，他长期以来就希求一种有关解决方法的观点，但在介绍自己的创新观点时，他还是持某种谨慎和保留的态度。

本书的目的正是希望以尽可能清楚的方式（这次是直接的，没有虚假的谨慎）陈述这对我们如此必要的新哲学，并且指出这种哲学如何能帮助我们在最具体的行动领域更好地面对属于我们的世界。一如任何真正的哲学，这种哲学完全不是突发奇想地躲避人们要强加于最轻信者头上的怪诞“帽子”，而是为了最深刻地思考什么能激发我们的活力，思考为什么我们至今尚没有合适的词语和视角。

克劳德·卡普里埃

目 录

自序	001
前言	003
导论 生活意义简史	001
第一章 爱的革命	043
第二章 为迎接新时代的政治	077
第三章 艺术和教育中的精神	133
结论 死亡，唯一的异议？爱，乌托邦？	197

导论 生活意义简史

吕克·费里 首先说说本书书名的选择。为什么对斯丹达尔^[1]情有独钟？当然，对再用他的书名《论爱》，我曾经犹豫过。榜样高不可攀，我担心借用它显得过于自负。当然应该把它视作报恩之心流露的称羡，视作对斯丹达尔如下告白的致敬，它深深打动了我，使我感到如此亲近：“爱于我永远是最重要的事情……或毋宁说是唯一重要的！”斯丹达尔要说的是，爱不仅仅是许多情感之中和其他诸如恐惧、生气、嫉妒或愤怒等情绪相同的一种情绪，它是一种新的意义原则，是良知生活未言及的观念的组织原则：正如我们下面要指出的，爱开创了思想和存在历史上的新篇章。

尽管爱无疑与人类一样古老，尽管它总是暧昧不清，伴随着矛盾，仇恨，它在现代家庭中的出现，即从包办婚姻 (*mariage arrangé*) 或基于利害关系的婚姻 (*mariage de raison*) 到通过或为了爱之花怒放(特

[1] 斯丹达尔 (H. B. Stendhal, 旧译：司汤达, 1783—1842)，法国作家，作品有《红与黑》《巴马修道院》《论爱》等。

别是对孩子们）的自由选择婚姻的过程，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依据，而且不仅仅是在私人领域。同样，艺术和政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因如此，私人生活的革命在公众领域中的折射，是我这本书所要探讨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最初有所犹豫，我还是认为，除了《论爱》这个书名，本书显然没有其他选择。

我先要告诉读者，我们并非立刻，而是在接下来的第一章中真正分析这种新的意义原则，如人们所说的“谈论爱”。然后，在第二章中，我要运用这种新原则的方式进行讨论，这种讨论彻底改变了无论什么样的最集体化和最公众化的领域——即政治领域——的局势，为的是让我们理解并非仅有私人生活的历史。随后，我们将从同样的视角出发讨论艺术和教育。

但是，在导论中，首先应该简要说明历史动力和人类活动的特点，二者使得范式的这种变化成为必然。要理解何谓“新意义原则”的真实意义、为什么要呼唤真正全新的哲学反思的“良好生活的新定义”，这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这就是为什么在一开始我就要做直至今日尚未做过的事情，即清晰地指出我在以往著述中曾经阐述过的两个主要概念之间的关联：一是作为对良好生活、智慧或世俗精神的哲学定义，也就是说，认为哲学和宗教一样，意在定义我们这些“要死者”的幸福生活，只是不通过上帝，也不通过信仰而已；二是我所说的“爱的革命”的概念，它伴随着现代欧洲从基于利害关系的婚姻和传统家庭婚姻到今天作为家庭基石的恋爱婚姻的过程。

两个主题不可分离，这就意味着爱的力不可挡的发展强势——作为我们生活的组织原则而言，后者将在不再只是存在的哲学领域，统领着对良好生活，以及与达到这种生活相适应的生活和智慧意义的新定义。很显然，私人生活的历史不能无效地停留在集体、公众甚至政治的生活中，这是我在此首先要分析的。读者将会看到，这种思考与传统政治范式的断裂如此之深，以至发现它还是很困难的。自由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一样，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统治现代欧洲历史的思想和行动的这两条线索，的确具有两个重要共同点：一是都游离于贵族政治范围，并属于私人范围和“世俗社会”之外；二是只把政治视作以普遍利益之名管理私人利益的形式，正如我下面要指出的，激情在历史中经常比纯粹意义上的利益起到更加出色的作用。

我们下面还会谈到这个问题。但在开始之前我们还要指出——尽管很简要——我的哲学反思的第一条导线的主旨是什么。

第一条导线：作为良好生活的非宗教追求的哲学定义

我在《学习生活》中已经非常清楚地阐明过这个意图。哲学实际上和中学毕业班上教授的老生常谈是两码事。建立在哲学教育上的文学教育倾向于只注意到证明的普遍技术、“思维方法”、“批评性思考”的培养，其理想就是让学生们能够“通过他们自己思考”，在诸如文本讨论或文本解释的练习过程中变得更加自立。很明显，这种计划我并不反感。这甚至是优秀的计划。只不过，它不是源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它只和哲学保持很遥远的关联——更多的是来自知性的公民

教育。如果我们对柏拉图、伊壁鸠鲁、斯宾诺莎^[1]或尼采说他们为写“论文”和“学习思考”进行哲学思考，我想他们干脆会哈哈大笑！
Philo-sophia：从词源上看，是对于“智慧”（sagesse）的“追求”或“爱”，这个词对他们还有一种意义，在尼采的格言中，诸如在以“为什么我如此智慧”^[2]为题的格言中均有所见。

我在《学习生活》一书中要指出的是，从古代哲学到海德格尔，中间经过斯宾诺莎、卢克莱修^[3]，康德或尼采，哲学永远——至少在最伟大的哲学家们那里无一例外——被设定为定义良好生活、至善、幸福生活和抵达幸福的智慧欲求，简言之，为必死者回答生命意义的重大问题的欲求。我称之为世俗精神性（灵修）或没有上帝拯救的学说。为什么？因为哲学，和那些具有同样目的追求——为注定要死的人们把良好生活的诸多条件同一起来——的各种重要宗教不同，它多少还要规定我们生活的终极意义，但不通过上帝，也不通过信仰。

有人会说，不存在这样的意义，“生活意义”的概念毫无意义，除非是从宗教观点出发，因为宗教认定：人可以说置身于外，生活之外为自己找到一个终极目的，而这只有成为教徒才有可能。就算这样吧！这种观点建立在一种诡辩之上，为之花费太多时间徒劳无益。我们只是要说，在它来搅乱我的读者的时候，为了消除混乱，在所有伟

[1] 斯宾诺莎（B. Spinoza, 1632—1677），荷兰哲学家，西方近代重要的理性主义者。

[2] 尼采风格独特的自传《瞧，这个人》（1888）中的一个章节题目。

[3] 卢克莱修（Lucrece，前 99—前 55），罗马哲学家，诗人。

大哲学中，都会询问我们生活的意义是如何形成的，能够从外部构建我们生活的终极目的的究竟是什么？斯宾诺莎特别执着地认为——我们不怀疑他屈服于生活的超越意义的幻想——对人而言，存在一种由于有哲学而被提出的终极目的，也就是说通过智慧和知性实现的拯救和快乐。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的最后部分又回到这个问题，他令人信服地向所有希望过幸福生活的人们指明通向幸福生活的真实之路。和没有读过《伦理学》、也没有经历过认识真实诸物的各个阶段的无知者不同，“真正的智者，内心平静，不受干扰，但凭借某种永恒的必然性，他具有对自己、对上帝和诸物的意识，从来没有停止过存在，并且享有真正的满足。如果我指出的通往幸福生活的道路显得极端艰难的话，人们还是可能寻找到的。当然，这道路的艰难还因为能找到它的人少之又少。如果拯救唾手可得，或者轻而易举就能获得，那怎么可能几乎所有人都视而不见呢？但是，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难得的，犹之乎它的稀少。”（《伦理学》第五部分，命题 42）^[1]

在斯宾诺莎看来——但他在此表达了一种所有伟大哲学家共有的信念——在什么地方看到的哲学完全没有沦为“好好思考”、甚至是独立的理想。当然，这两种性质并非是从哲学中得到，它们只是必要的条件，算不上是真正的哲思。因为，哲学归根结底不是写论文的技巧，而是世俗拯救的学说，是没有上帝的智慧，在把宗教视作伟大的一神教的意义上说绝对没有上帝，而且没有信仰的救赎，因为，通过

[1] 译文译自法文本，参考了中译本，《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14 版。